



Lonely Hundred Years

Zhang Xueliang's Thought Life

孤独百年

张学良的思想人生

王海晨◎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Lonely Hundred Years

Zhang Xueliang's Thought Life

孤独百年

张学良的思想人生

王海晨◎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独百年：张学良的思想人生 / 王海晨著. --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 1
ISBN 978-7-5154-0653-4

I. ①孤… II. ①王… III. ①张学良(1901~2001)
—人物研究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7336 号

出版人 曹宏举
责任编辑 姜楷杰
责任校对 康莹
封面设计 彭莉莉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辑部 (010)66572264 66572154 66572132
市场部 (010)66572281 或 66572155/56/57/58/59 转
印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 30.25 印张 1 插页 408 千字
版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010)66572159 转出版部。

序一 令人耳目一新之作

王海晨同志的力作《孤独百年——张学良的思想人生》即将出版，可喜可贺！

早在1988年，我就读过他与胥波同志翻译的《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剧——张学良的政治生涯》^①，受益匪浅。2009年，我与胡玉海老师邀请他参与整理、主编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收藏《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从此相识，交往颇多，成为挚友。他是温州大学一名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的教授，也是一位研究张学良的学者；曾有《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张学良全传》、《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九一八事变研究》（1—4卷）等专著出版，今又有新著呈现，足见他是一位研究张学良的专家。

众所周知：张学良出身于军阀家庭，弱冠之年即长方面。他经历了中国近代社会最动乱时期的所有重大事件。其世纪人生与中华民族的荣辱、国家兴衰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救中国。他始终秉承“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之古训，竭力息内争御外侮；为促进国家和平统一，举行东北易帜；为结束新军阀混战，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为抗日救国，他与杨虎城将军力挽狂澜，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实为“兵谏”）。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他视国家、民族利益如生命，不惜牺牲一切；为了民族大义，无私无畏，无怨无悔。

张学良的爱国人生可谓曲折、坎坷而又极富传奇。因此，不少学者、记者和艺术家都在研究他、追踪他、歌颂他，以至流传着“说不尽的张学良”这样的话。有关他的传记、论文、戏剧和影视作品之多、著书立论之广，在近代爱国将领中无人可与其媲美。

^①〔美〕傅虹霖：《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剧——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王海晨、胥波译，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张学良执政八年，西安事变使他的政绩达到了光辉的顶点，也是他蒙冤受屈、失去人身自由的起点。即便身遭“幽禁”，仍不改爱国初衷，耄耋之年，还想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做点贡献。

然而，海峡两岸学者对张学良及其西安事变的评价却分歧巨大，有个别学者认为，张学良是“花花公子”、“不抵抗将军”，是坏了蒋家江山的“千古罪人”等。而大多数学者认为，在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全国抗日浪潮不断高涨的情况下，抗日是民族大义，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蒋介石不顾民族大义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的呼声，调集数十万大军威逼西安，要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才逼出了西安事变。

至于西安事变的意义，当年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和张学良自己都有很高评价：

毛泽东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①

周恩来说：“历史应该公断，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先生的抗战是张、杨两位将军顺应人民公意逼成的。”^②

蒋介石在1936年12月26日的通电中称：“自经此次事变，我国同胞一致爱国家的热诚以显示无比伟大之力量。此种伟大，在今日为奠定危局之主因，在将来必为我民族复兴之保障，此则中正愧疚之余敢为国家称庆也。”^③他钦定12月25日为民族复兴节，没有西安事变，何来此节？

张学良在1937年元旦《致东北军将士书》中称：“‘双十二’事件，是我们国家存亡绝续的分野，我们自相砍杀的内战，是要从此绝迹了，我们抗日复土的光荣战争，是马上就要见之行动了，我们的民族与国家已有了复兴的希望，这显然是我们中国划时代的一个事件，不独是我们可以期待着国策转变适合了民众的要求，且投下了一块巨石于国际深潭，忽然飞沫四溅惊醒了世界苟且偷安的人士与夫野心帝国主义的憧憬与迷梦。”^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与国际地位的提高，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已屹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7页。

②《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8页。

③《中央日报》1936年12月27日。

④周毅、张友坤主编：《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77页。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事实，凡是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为此而高兴。实践证明，西安事变具有重大现实与深远的历史意义。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光辉将更加灿烂！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张学良也有自己的错误、缺点与不足。他奉父命参与军阀混战、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围剿”红军；还有过吸毒史和荒唐的私生活。对此，他从不文过饰非，对人可以坦诚相告，对己则责之堕落，并下定决心，彻底改过，改过前后，判若两人。瑕不掩瑜，过则无惮改。无论学术界有何争论，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足可盖棺论定，其爱国爱民的思想品德与刚直不阿、光明磊落、开诚布公的立身处世之道，是华夏子孙永远学习的典范，并激励我们为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奋斗！他的爱国业绩和爱国精神对于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都将是不朽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张学良誉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者”，他是当之无愧的。

“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合作，促成蒋介石一时成为全国的抗日统帅和‘世界五强’（按：美、苏、英、法、中）中的一个领袖人物。八年抗战，这是他最受全国人民拥护的时期。”^① 蒋介石之所以被共产党击败，是因为他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派系林立，互相倾轧，官员贪污腐败，从根本上背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1948年，蒋介石就说，国民党的失败是自己造成的：“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②

美籍华人唐德刚教授说得好：“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制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以何种脸谱出现，我们写历史的人就很难妄猜了。……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西安事变提早全民抗战是真，使反对派的中共因此壮大也不假；但是说它毁灭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那就过甚其辞了。”^③

① 张友坤：《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东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② 〔美〕易劳逸：《蒋介石与蒋经国》，王建朗、王贤知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页。

③ 唐德刚：《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见〔美〕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王海晨、胥波译，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再说了，前些年国民党在台湾曾发生分裂，大选失败，由执政党变为在野党，自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者，又是谁之过？河南民间有一谚语：“手不溜（即手不利索），怨袄袖；袄袖长，怨他娘。”任何事情的发展变化，最终决定于内因。国民党若不从自身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只停留在寻找客观原因的怨天尤人上，都是难以有所作为的。国民党如此，其他任何党派也不会例外。

2014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决定把9月3日定为十四年抗战全面胜利纪念日。2015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我们纪念抗战胜利，千万不能忘记为此做出过特殊贡献的张、杨二将军。我想，新著出版，恰逢其时，是对张将军的最好纪念。

我有幸先阅书稿，收获多多。作者紧紧围绕张将军所处的时代背景、特殊地域、家庭出身、传统文化和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运用国内外的大量历史档案、学术研究成果及最具权威的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收藏《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引经据典，多角度、全方位地详细论述张学良爱国思想的产生过程及表现。如果说过去的不少类似专著，只讲是什么，不讲或很少讲为什么，那么该著的独到之处则是史与论、情与理、叙与议紧密结合，从思想层面深刻地阐明了张学良的思想人生，它既是别具一格的张学良传记，也是张学良的思想史；具有新视角、新史料、新观点之特征，尤其是对张学良的国家观、日本观、战争观、两岸观、历史观、宗教观的研究，填补了张学良研究领域的空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读者阅后一定会有耳目一新之感！

王海晨同志在张学良研究方面早就硕果累累，谨此新著出版之际，写了以上那些文字，意在为新著添加一点言外之意，是为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张友坤

2015年12月于北京

序二 论张学良何以孤独

王海晨教授将他刚刚完成的《孤独百年——张学良的思想人生》文稿，发给了我，让我找毛病、提意见。作为多年的朋友与合作者，我只好从命。

一看书名，就知道这部专著的分量很重；再一读稿，知其学术价值非同一般。全书史料新，作者将张学良存放在美国的145盘口述录音内容进行了系统爬梳并引用；框架搭建上，挑战了依人记事、依时展开的写作传统，突出了问题的系统性、人生的思想性和解读人物的方法论意识；行文轻巧，思辨色彩虽然很浓，但读起来不觉得沉重。预计此书出版后，不会泥牛入海，必将在学术界引起反响。

我把我的读稿体会向他述说之后，他要我为这部专著写个序，我有些为难，如果对这部专著归类，它既是一部人物传记，更是一部思想评传。以我对张学良的研究，为这部传记写个序，还敢承担。可为这部思想评传作序，真是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当我向王海晨教授流露这种为难情绪后，他嘱我随便写些什么都可以，这只能勉为其难了。

作者以“孤独百年”作为这部思想评传的主标题，并非只是匠心独具，而是他“走近张学良”后的准确把握和定位。“孤独不是慎独，慎独是一种自我约束的状态，而孤独的人是想摆脱他人的约束而无方，寻求他人的理解而不可得”。这样定位，是对传主深层次的理解，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这种理解是走进张学良心灵的钥匙，是评论张学良思想的基本条件，是解读张学良人生行为的密码。

走近张学良，发现他的“孤独”

走近张学良，也只有走进张学良心灵，才能评论他的思想人生。但不是谁想“走近”就能“走进”的。王海晨教授既具备这样的主观愿望，同

时又具备这样的能力和水平。

早在1987年，王海晨教授就翻译了由美国华裔学者傅虹霖博士撰写的《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在这部译著中，译者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作了大量的创作努力。该书出版后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人民日报》发表的书评说：“和国内以往行世的同类书籍相比，本书显得更有特色，更经得起咀嚼和引人思索。”也就是从这部译著起，王海晨教授开始一步步走近张学良，2001年12月，在张学良逝世两个月后，王教授与本人合作历经几年终于完成了《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一书。这部近百万字的专著一出版，就受到学术界和社会上的普遍好评。为了走近张学良，王教授还考察了张学良在大陆和台湾的囚禁地，通读《张学良赵一荻合集》和《张学良口述历史全集》。就是说，走近张学良应做的功课他全做了，做好这些功课，是走近张学良，完成这部“思想人生”的必备条件。

如果说完成这些功课，是走近张学良的必备条件，只要有主观愿望就可能实现；而走进张学良心灵，只有主观愿望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天赋和水平。在我们合作《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时，他就体现出这方面的天赋和水平。在研究大纲时，他十分注重这种心灵考古，如“闭锁的心扉第一次打开”，“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等；他善于宏观架构，更能通过细微发现心灵变化，如“放下《明史》，捧起《圣经》”，“三个师换来的一针清醒剂”等。

这种心灵考古在《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中，只是在个别章节上的体现，而在《孤独百年——张学良的思想人生》中，则通篇皆是心灵考古，在理清了张学良思想来源的基础上，考察了张学良的国家观、日本观、战争观、两岸观、历史观、宗教观，并最终得出结论，张学良思想人生的最大特点是“孤独”。“孤独”既是张学良思想人生的特点，也是他思想人生的背景。张学良思想人生的“六观”，都是在“孤独”中产生和形成的。

人们可能会问，作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的长子，奉系集团的核心成员，民国初年社会上公认的“四大公子”之一，同时也被看作最为耀眼的政治“明星”。他也会“孤独”？作为东三省政务委员会主席、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他怎能“孤独”？如果从张学良显赫的家庭出身，不凡的社会地位，诸多形而下地去看，他没有理由“孤独”，也不可能“孤独”。但是，当你如作者一样走近

张学良，特别是走进张学良心灵，就会发现，他不仅“孤独”，而且是“百年孤独”。

外敌侵袭，令他不能不“孤独”

张学良的“百年孤独”，是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一个缩影。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就不断遭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欺凌。面对一个又一个耻辱条约的签订，一片又一片国土的被割让，一件又一件被外人欺凌事件的发生，一个又一个无辜百姓惨遭杀害，直至野蛮的大屠杀等等，又有哪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不感到恐惧、悲惨和孤独？

张学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而直接让他产生孤独无助感的，是日本在东北侵略势力的扩张。十四五岁的张学良，在奉天的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日本军人的蛮横，让他感到不公；在偷听父辈交谈与日人的关系中，让他感到日人的无理。特别是日本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派兵占领了德国于1898年租借中国的胶州湾地区。次年，又以武力相威胁，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些，让还是个少年的张学良感到非常悲愤，他说：“那时我很悲观，思想消极，为什么悲观？我看东北在日本的势力下，也没有什么发展了，‘二十一条’那一签，我们东北人差不多是半个亡国奴了。”^①

张学良“孤独”的缘起，是源自于日本在东北的侵略势力，而让他“孤独”一生的，是日本对中国发动的武装侵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作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副总司令，守土有责，本应奋起抗敌，而他却下令东北军不予抵抗，全线南撤，由此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人们骂他是“不抵抗将军”，没有骂错，因为是他下令不抵抗。一般人不会去想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似乎也没有这个必要。有些知道内情的人，也可能会说，蒋介石于1931年7月23日发布的“攘外必先安内”国策，只是一个宏观方针，东北地方有相当的自主权，他张学良完全可以不顾忌这些呀！在大多数人看来，丢失东北的责任要归罪于他一个人。对此，张学良不争不辩，也没有理由争辩，只能承担这一责任。

^① 参见《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1693页。

他说：“东北不收复，东北军永远低着头，无颜见人。”^① 永远低着头，让这位具有显赫地位身份的将军，心理承受极大的苦闷，精神陷入高度的“孤独”。

“九一八”事变，是国家的痛，是全中国人的痛，更是张学良永远的痛。“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率东北军退入关内后，有人往东北军这种亡省之伤口上撒盐，说他们是“亡国奴，讨饭吃”。张学良虽然对部下劝告说，这种话“出诸国人，毫无可羞”，“吾当以量大对之”。面对这种相互叠加的苦闷、孤独之痛，既不能怨天尤人，更不能一蹶不振，而是要摆脱苦闷，承担责任。张学良把个人的苦闷和孤独之痛苦，与国家的痛苦看成是一体的。他对东北军官兵说：“我希望你们要深知国家的苦痛就是我们的苦痛，我们的苦痛是从国家的苦痛生出来的；要想根本解除我们个人的苦痛，则非从解除国家的苦痛上着手不可！”^② 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在这段时间内，张学良多次在公开场合，号召东北军官兵，我们“应当兴奋起来，打破一切苦闷”^③。怎样打破这种苦闷，他认为唯一之良方，就是“坚确决心，把自己无条件的奉献于社会和我的国家”。他不断向东北军官兵强调，要“坚定民族复兴信念”，为了民族和国家这个大我，不要自私，要肯于自我牺牲。

张学良在极为苦闷和“孤独”的状态下，积极寻求摆脱苦闷的良方，并找准了收复东北这一方向。只有收复了东北，他和他的东北军才能扬起头，才能一扫苦闷阴霾，走出“孤独”。

为此，他听从蒋介石的安排出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目的是尽快实现“安内”，以便尽快去“攘外”，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张学良是为了尽快实现“攘外”，才去“安内”的，但一年多的“剿共”实践，与他追求的目标却渐行渐远，他的东北军损失惨重，而日本的侵略势力，却越过了山海关进入了华北地区，不断进逼。是为了拯救民

^① 张学良：《对东北各军送庐山军训团第一期军官的讲话》1934年7月27日，毕万闻：《张学良赵一荻合集》第5部，第18页。

^② 张学良：《对东北各军送庐山军训团第二期军官的讲话》1934年7月27日，毕万闻：《张学良赵一荻合集》第5部，第26页。

^③ 张学良：《下最大决心为民族争生存》1934年7月27日，毕万闻主编：《张学良赵一荻合集》第5部，第87页。

族危机，才去“剿共”的，结果却遭致民族危机越加深重。严重的现实，让他再度陷入更深的苦闷之中。

在极为苦闷和“孤独”的状态下，不自暴、不沉沦、不放弃的性格特征，让张学良找到了实现“攘外”的正确途径，那就是停止内战，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这一途径与他原来主张的“全国抗战”论相一致。为了实现停止内战这个目标，他在内部进行调整，加大抗日的宣传；对外与红军协调关系，加强联系；对上不断做蒋介石的工作，劝蒋停止“剿共”，共同抗日；等等。

这个时期，张学良的极度苦闷和“孤独”的状态，与国家民族危机日益加重是同步的，张学良需要重新做出选择；每一个中国人都应正视民族危机的现实，重新做出选择。作为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的重新选择，具有决定意义，如他不改变内战政策，就不能实现全民族的共同抗战。对于这一点，张学良看得很清楚。因此，他在“苦谏”、“净谏”、“哭谏”无果的情况下，实行“兵谏”，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实行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结束了持续十年之久的内战局面，这是国人最值得庆幸的一件大事。

然而，这距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还有很远的路程。所以，作为推动实现这次历史转折的功臣张学良，还是不能扬起头来，他仍处于苦闷和“孤独”的状态中。

文化冲突，让他无法摆脱“孤独”

在张学良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中国正处于东西文明碰撞、交融的高潮期。尽管如此，出身于一般家庭的人，所受的文化影响仍是传统的。但张学良则不同，由于特殊家庭背景的原因，他几乎是在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同时，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张学良在中国传统的儒道释思想文化观念里，也渗进了一些西方文化的因子。异域文化或者说新旧文化间的冲突，让他很早就陷入“孤独”苦闷之中。

张学良在接受传统文化教育时，就表现出陷入这种“孤独”的苦闷。如他喜欢读四书五经和古诗词，但不愿意甚至反对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

他感谢老师对他学习生活的付出，但却反对和不服从老师对他严格、刻板的管教；他敬重老师的道德文化，但却不能接受老师的政治理念。为此还曾与老师发生了严重冲突：一次，老师让他作一篇论文，题目是“论民国之害甚于君主”。张学良一看到这个题目，就十分反感。于是，便写出了批驳这一观点的论文。他在文章开头就旗帜鲜明地写道：“‘民国之害甚于君主’这种话都是田舍翁说的话。”接着引经据典，按逻辑一一展开，观点极为鲜明，认为“非由于民主之弊，乃由于帝制余孽，不解民主为何之老朽昏庸作祟所致，待余孽死绝，民主之光自显”^①。最后，下结论说：“这种思想就是不明中外大势，不懂古今历史，正所谓坐井观天之论！”由论文导致政治理念上的冲突，让老师尊严受损，提出辞馆。经其父张作霖找明白人秘书长袁金铠评判，袁认为这位杨老先生已不适合做张学良的老师，张作霖才同意老师辞馆，另请新的老师。

张学良到了十七八岁时，已有了自己的从业志向。他回忆说，“有一段时间，我立志学习制药，后来又很想学医，想当名医生。……可我父亲他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也不说反对，就是不吱声，不表态，那我就没法子了。实际上他想让我当军人。可我实在是不想当军人”。^②为了能够实现自己学医的目的，他与身边的好朋友，做了很多的策划和努力，但最终还是遵从父意，进军校学习军事。张学良回忆说，“我的父亲非常信任我的老师，我又没有母亲，无法声诉我的志愿”^③。由此可看出，这个青年人当时无助的苦闷心情。

在父命难违的传统力量高压下，使他本非所愿地成了军人后，这种苦闷“孤独”似乎让他难以摆脱。他崇尚民主自由，反对封建专制，但却必须在奉系军阀集团中扮演重要角色；他追求国家和平统一，反对内战和分裂，但又必须冲杀在内战的第一线。这种矛盾何人能解？这种苦闷“孤独”向谁诉说？1927年春，张学良在河南对抗北伐军前线，收

^① 《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体遗著》，台北，历史智库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75页。

^② 参见《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1867—1868页。

^③ 《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体遗著》，台北，历史智库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74页。

到他二弟张学铭的来信，他借复信二弟之机流露心中的苦闷。说自己是“奉命讨之，但一念是同种，自相残杀，心中又怏怏焉，如有对外征战，则兄马革裹尸，死无恨也”^①。这是他极度苦闷的心态和怀疑这场战争的自然反映。

对同种自相残杀的内战，张学良从始至终持反对立场，但他又无力独善其身，还必须冲在内战的第一线。长期处于这种矛盾心态的他，不能不有所流露。1924年12月1日，他在北京大学欢迎大会上发言说，“良不过一军人，自己但知军事，他无所学。良不愿为军阀，军人所以成军阀，固不仅问分内事，且干预分外诸政”^②。只有24岁的当红军官，敢公开批评军阀政治，支撑他有这种勇气的正是他内心矛盾的纠结。

生活在军阀政治之中的张学良，内心矛盾纠结的“孤独”，是很少有人能理解的。1928年奉军攻克冯玉祥据守的南口后，京师警察总监等拟演剧庆功，张学良致函谢绝，指出：“战士暴骨，饿殍载途。衷且不遑，曷敢言庆。”“同根相煎，胜亦何足言功”。^③作为奉军高级指挥官，打了胜仗，居然说出“胜亦何足言功”的话，流露了他对这场战争意义的否定，表现出他个人对“同根相煎”现实的无奈。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当时张学良对持续不断的内战，是从内心表示反对的。然而，当郭松龄以反对内战相号召举旗反奉时，他却未能站在郭松龄一边，而是站在父亲张作霖一边，并由他亲自指挥打败了郭松龄。这次站在哪一边的抉择，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次抉择。郭松龄反对军阀制度、反对内战、反对军人干政等政治主张，与他所追求政治理念相一致；而且在张学良心目中，郭松龄为人正直，知识丰富，有爱国思想，积极主张改革，是自己做人做事的老师；在共同治军和指挥作战中，他服从命令，勇于负责，刻苦耐劳，作风严谨，深受官兵爱戴，是辅佐自己成就大业的难得助手，最忠诚的部下；在多年与郭相交中，无话不说，推心置腹，互信互谅，互敬互爱，郭是他最真心的朋友。

论理、论义、论情，都应支持这位老师、部下、朋友；可这位老师、

① 《北洋画报》第94期。

② 《晨报》1924年12月2日。

③ 《晨报》1926年8月22日。

部下、朋友拥他上台，要打倒的却是他的父亲。这让张学良陷入极度痛苦之中。如果和郭松龄站在一起，以武力取代父亲的地位，舆论必以“叛逆”相加，失去部属的拥护，难于立足于社会。当郭松龄向张学良提出这一要求时，他不能立即做出正面回答，却陷入左右为难的极度痛苦之中。就在这时接到父亲以“汉卿先生阁下”为抬头的急电，这说明父亲已经怀疑他了。老师相逼，父亲误解，让他痛不欲生，只有蹈海一死了之，是卫士看得紧，才没死成。

张学良的最后抉择表明，封建伦理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里是根深蒂固的，“臣当忠，子当孝”，谁也不能摆脱这一思想束缚。尽管张学良思想中渗入了民主、自由、平等的西方文化因子，但在这场文化冲突的抉择中，“子当孝”的封建伦理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在张学良的一生中，这种因文化冲突让他陷入苦闷和“孤独”，几乎是贯穿他的一生，包括他执政时期和被囚禁时期。他长期陷入苦闷和“孤独”，是由三大因素决定的：（1）本人文化结构。他自身文化上的多元性，就导致他无法摆脱苦闷和“孤独”。（2）本人的社会角色。张学良一生中的社会角色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一是“人上人”的高官阶段；二是“人下人”的囚禁时期。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角色，都要求他不能随便讲话，而只有享受“孤独”的权利。（3）社会现实。一是中国近代社会长期被侵略，又内战不断的现实。二是他长期被囚禁的现实。处在这样残酷的社会现实之中，他怎能摆脱苦闷和“孤独”？

担当精神，使他选择了“孤独”

历史人物，能不能成为名垂千古的历史人物，要看他是否引导或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张学良作为历史人物，他的执政生涯只有八年时间，但却经历了东北易帜、“中东路事件”、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等重大历史转折事件，每一次转折都与现代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作为历史经历者和创造者，张学良在这些事件中都扮演主要角色。无论是担任主角或是导演，都表现出一种责无旁贷的担当精神。这种担当精神，有的让他获得荣誉、地位，如实现东北易帜后，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有

的则让他头上的光环更加耀眼，赞美声不断，如武力调停中原大战后，高升为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堂，炙手可热。人们更称赞他：“巩固边防，劳苦功高！”“是和平息戈的使者！”“是国家统一的表率！”等等。然而，这种担当为他带来的光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全部脱落，对他的赞美声，则变成责骂声。

担当，更多的是让他遭受奇耻大辱，成为他永远的痛。“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一背就是半个多世纪，在这期间他不争不辩，也没有条件争辩。他说“用不着跟他辩”，毁誉由人，说骂由你。^①这种承担更表现在蒋介石去世后，当张学良有权利开口说话时，“九一八”事变的主要责任人蒋介石不在世了，他可以讲出“不抵抗”政策形成的来龙去脉。然而他不仅没有这样做，还明确地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②张学良不去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总政策，而强调是他下达的不抵抗命令。这样做既符合历史事实，同时，又（在人格上）保护了他自己，（在政治上）保护了蒋介石。不为自己的错误找客观理由，进行辩解，是这种担当行为，让他选择了承受“孤独”。

不管张学良主观上是否要洗清“不抵抗”的罪名，而在事实上也难以洗清。“罪名”让他“孤独”是必然的，而功名同样让他更加“孤独”。

西安事变，是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以兵谏的方式，逼迫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事变是以兵谏的方式开场，最终以和平的方式完成，体现了一个伟大民族的成熟与智慧。无论是以兵谏的开场式，还是和平的完成式，都展现了张学良的伟大担当精神。他冒死将天捅了个“窟窿”，又冒死去补这个“窟窿”。他捅“窟窿”和补“窟窿”，都是为了达到成就“大我”的目的。这种伟大的担当，成就了中华民族的“大我”，扭转了历史发展的方向。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

^① 张学良口述，唐德刚著：《张学良口述历史》，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344页。

^② 李明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香港信报》2001年10月16日。

的枢纽”^①。也有的评论说，西安事变改变了一个国家、两个政党和三个人物的命运。对后者的评论，站在不同角度可能有不同的解读，但对张学良成就“大我”的目的都是持肯定的态度。

西安事变采取兵谏的方式，应该说不是最佳的途径，但却是当时不得已的唯一选择。选择这种非常的方式，改变国家近代以来混乱的惯性方向，制止了内战的继续；停止持续十年的内战，全民族共同抗战局面的出现，向世界展现了一个完整和统一的国家形象，一种团结和自觉的民族精神；避免了国家和民族滑向万劫不复的深渊。由此，张学良便成为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千古功臣”。

而这位“千古功臣”，却因此遭受“千古奇冤”，被囚禁长达半个多世纪，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极为罕见。人们在评论这一问题时普遍认为，如张不去南京送蒋，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但这不符合发动西安事变实现共同抗日的初衷，张学良对这种命运是有心理准备的，但又极力地向好的方面去想去设计。他说：“我这次冒生命危险，亲自送委员长回南京，原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出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到西安，这出戏岂不可成为千古美谈！真可惜，一出极好戏竟演坏了！”

选择冒死抓蒋，是为了改变蒋的内战政策；选择冒死送蒋，是为了让蒋更好地领导抗战。这种忘我的担当行为，是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应该得到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全中国人的理解。

然而，蒋介石没能和上张学良这“一送”、“一放”的“好戏”。这样，这种崇高的道德理想，让张学良陷入了长久的“孤独”之中；也正是这种崇高的道德理想，让他的人生展现出一种悲壮的辉煌。

总之，考察张学良的思想人生，立意“孤独”，切中了要害，抓住了本质。由表及里，拨云睹日，展现了一个真正的张学良；并告诉人们，张学良身上体现的崇高的道德理想和圣洁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胡玉海

2015年12月于沈阳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7页。